

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2.02.009

#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违式、填榜、科录考析<sup>\*</sup>

王玉超,刘明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最为熟悉,其中有关乡试违式、填榜和科录的具体事宜,科举文献并未载录全部规制细节,小说作者却对此有所表现,他们以其亲身经历对此进行细致描述,反映了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面貌。查找小说中的相关资料可以起到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小说;乡试;科录

**中图分类号:**K2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84)

**作者简介:**王玉超(1982-),女,黑龙江双城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刘明坤(1974-),男,山东新泰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明清小说作者参加乡试者所占比例较大,他们对科举中的乡试最为熟悉,小说中出现的乡试内容也最多。有关乡试中违式、填榜和科录的问题,科举文献均有记载,但由于史料记载模式的限制,具体细节并未全部写出。小说作者与史官不同,他们站在应试者的角度,以其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乡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进行描述,真实反映了三者在实际过程中的面貌。

## 一、违式试卷的贴出

明清乡会试的考规十分严格,仅就试卷而言,就有诸多要求。如果出现违式的情况,试卷会被贴出,举子按例除名不准应试,贴出的试卷单列一榜,榜单自有其形式。为了能够参照评阅,科举文献对试卷违式的相关规定记载还比较详细,至于贴出的榜单的情况就很难查寻了。

此制在明代较严,如果出现没有避讳、试卷写作的格式不正确(如写到圣、谕等字时未顶格)、有污损涂抹、空行空格、书写字体没按要求,甚至有“草稿不完者”均要被贴出。<sup>[1](P1605)</sup>清沿此制,只是

实际上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时,已经相当宽松了。《阅世编》中有载:“科条宽简,亦从来未有。凡试卷除不完及污坏最甚而外,一概差失,并不许粘贴。宿场至次日午后,犹未誊完者,亦不许抢卷,直待誊完后类收,多士德之。”<sup>[2](P146)</sup>如果未遇到极为严重的情况,一般是不会被贴出的,这一点从明清小说中可以看出。《醒世姻缘传》中的主簿说,他的乡试试卷多做了两股就被大主考贴了出来,这部小说的作者署名西周生,即使疑其为蒲松龄,也还是生活在清代初年,此时违式之制尚严。在清代一般被贴出的试卷,违式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女开科传》写贴出的试卷,“当时受卷官检出白卷子三束,送监临验过,登时贴出贡院门外,不在话下。”此卷贴出是因为举子交了白卷。《女开科传》固然是虚构,但模仿的细节却是当时科场的实际状况。《儿女英雄传》中写到绷僧额的试卷被贴出,其原因是试卷格式有误,据小说中的梅公子讲,他的试卷是“三道文题合诗题,都接连着写在补草的地方,却把文章从卷子的后尾,一行行往前倒写。”对于试卷格式在科举中有相关规定,如文要顶格,诗策低两格等,绷僧额的情况是严重的违式,被贴出亦是理所当然。从

\* 收稿日期:2011-12-25

小说中贴出试卷的变化来看,这一制度在清代确实要宽松多了。

按科举制度,凡被贴出者除名,就此失去了继续考试的资格,更不可能在此科中试。但小说《樗机闲评》中有膏梁子弟崔铎,只读过几句书便进了学,在乡试中他取中了第二名,而应考举子纷纷议论:“他二场已贴出过的,如何还得中?”崔铎虽然违式,仍由于内中原因得以取中第二名,这种情况显然不属常例。《醒世姻缘传》中写道:“他指望那科就可中得,果然头场荐了解,二场也看起来,偏偏第三场落了一问策草,誉录所举将出来,监临把来堂贴了,房考等三场不进去,急得只是暴跳,只得中了个副榜。”后又有主簿自叙:“甲子科场里本房已是荐了,只因二场表里多做了两股,大主考就把卷子贴出来了,挂出榜来,只中了一个副榜。”小说中也说到了试卷违式的情况,并提到贴出后不准继续应考,他们也不可能被取中,但是却可以取中副榜,这一点科举文献中未见到过说明。

违式试卷的贴出单列一榜,榜单写法还有特殊的样式,不但写明被贴出之人,还写出因何原因被贴出。《儿女英雄传》中写道:

托二爷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悬,贴出去的人也不少。那张紫榜,我倒看见了,有的注诗文后自书阴事的;有的注卷面绘画妇人双足的;就连咱们那日看见的那个绷僧额也贴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样闹法,焉得不贴!他名下是怎样注的?”

小说中提到,在贴出的榜单上,每名举子姓名之下都会作注,如有人在试卷上书阴事、画双足之类,如此荒诞不经的状况出现在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确实令人大为诧异,此类当属“污坏最甚”而被贴出一类。可见姓名后的注,用以明示贴出的原因,此项应表示科举公正之意。

商衍鏊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乡试一章中也提及贴出之事,其云:“即将违式之名贴出,谓之蓝榜。凡贴出者除名。”<sup>[3](P67)</sup>他说贴出之榜为蓝榜,小说中与之不同,上段《儿女英雄传》引文中写的“紫榜高悬”即贴榜,然而小说所谓紫榜非蓝榜。明清科举中有五色笔之说,即不同的官吏在所司其职时,为了以示区分而使用不同的笔色,其中受卷、誉录、对读官所用笔色在明时为红,清时为紫,内收掌、书吏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时用紫笔,余皆用蓝笔。上面几部小说中提到的负责贴出的官吏有大主考、受卷官、誉录、监临,这几位官员在清

代科举中,除大主考用红笔外,其余皆用紫笔。故此,对于贴出之榜除商衍鏊所说的“蓝榜”外,还应小说中的紫榜之例。

## 二、乡试的填榜

贡院内最喜庆、最热闹的场面莫过于填榜这一环节,此时经过了进场前严肃的仪式礼拜、举子在考场内的紧张考试、考官在考试之后的忙碌阅卷,此时可谓万事齐备,只需填榜收纳人才了。

小说作者往往喜欢描摹热闹的场面,而填榜正是他们乐于描写的场景之一,因此,若要详细了解填榜时的具体事项,就必须向小说中寻求。《儿女英雄传》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此均有描写,将两部小说结合起来看,乡试填榜的全过程便一清二楚。《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五回写:

却说这年出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这天。前两天内外帘的主考、监临便隔帘商量,因本科赴试的士子较往年既多,中额自然较往年也多,填榜的时刻便须较往年宽展些才赶得及,因此到了九月初九这日,才得辰刻,便封了贡院头门,内外帘撤了关防,预先在至公堂正中设了三位主考的公案,左右设了二位监临的公案,东西对面排列着内外监试合十八房的坐次,又另设了一张桌儿,预备拆弥封后标写中签,照签填榜。当地设着一张丈许的填榜长案,大堂两旁堆着无数的墨卷箱。……不一时,预备齐集,点鼓升堂。主考才离了衡鉴堂,来到至公堂合监临相见,各官三揖。……向例填榜是先从第六名填起,全榜填完了,然后倒填前五名。……当下只见那位大主考归坐后,把前五魁魁卷挪了一挪,伸手先把那中卷里头一本第六名拿起来,照号吊了墨卷,拆开弥封。拆出来大家一看,……这个当儿,那边承书中签的两个外帘官早已研得墨浓,蘸得笔饱,等着对过朱墨卷便标写中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三回写:

直等到九月十二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内外监试、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吏一面写,从第六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

照着,也有一点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什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五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烛的更是热闹。直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

从小说的描述中可知,填榜时间在放榜之前,填好后马上可以张挂,但是根据录取人数的多少,填榜的具体时间并不固定,多数是从放榜的前一天晚上开始,如果人数较多,一般从放榜的前一天上午就开始进行了,即小说中所说的辰时。准备填榜时,首先封了贡院头门,内外帘撤了关防,点鼓升堂,科场内的全部官吏齐集至公堂,主考位于中间公案,监临在左右两侧公案,内外监试和十八房同考并列东西对面,而提调、巡绰、收掌等官也于至公堂内各司其职。另有报喜的报子此时也屯在贡院门口,买通贡院里面的书办,等待填榜的名次传出,赶去报录领赏。在正式填榜之前,至公堂内设填榜长案,两侧放墨卷箱,以备吊取墨卷之用。填榜有其规矩,即从第六名开始填起,正榜填好后再填副榜,最后填写正榜的前五名。开始填榜,首先取出朱卷放到公案上,再吊取相应的墨卷,拆开墨卷的弥封,让大家看一看,标写中签,唱名一次,再由榜吏填到长案上的中式榜上。此时,两旁的人点着蜡烛或一把香,照一照再拿出去熄了,此烛和香以讨吉利,乃科举风俗而非规制。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所写,正榜填完已四更天,副榜填完已近黎明,正榜从第六名开始和副榜全部填完,再拿出前五名的试卷进行填写。一切完毕,最后打开龙门,张贴试榜。

从填榜的过程可见,其中的事项如用蜡烛或香照看取中试卷、书办与报录传递取中消息,这都是在长期的科举填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填榜的时间在放榜之前,但到底在什么时候还要看具体的乡试情况,这些内容当然从科举文献中不可能见到。小说中常有考中前列的举子,却迟迟等不到报录的消息,或报录者常常半夜登门,这都与填榜的时间和规矩有关。《型世言》中就写:“到揭晓之夜,李公子未敢信道决中,便高卧起。只见五更之时,门外鼎沸,来报中了三十一名。”五更之时报子来报喜,中了第三十一名,上述小说中也说到四更时除前五名,正榜已填好,而此时五更报录到家,时间恰好吻

合。所以了解了填榜过程,很多现象就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明清会试的填榜规矩与乡试相同,小说中也有具体描述,但却不如上述两部小说详尽。对于填榜的了解,寻求于小说是最好的途径,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惟一的途径。

### 三、乡试中的各种科录

明清科举在发榜之后,官方和私人会刻印各种科录。明清小说中出现了多种科录名称,如题名录、登科录、小录、乡试录、会试录、同年录、序齿录等。虽然明清时期每一科考试之后,都有各种科录产生,但刻印的目的、方式和内容还是略有分别,根据小说中的不同叙述,可以对此作一区分。另外,由于会试后的各种科录与乡试相似,这里一并说明。

题名录由来已早,唐代科举中之登科记即其端始,故题名录又称为登科录。乡、会试所刻的题名录内容相同,并且都是官方刻印的科录,它作为科举的程式之一,书写于唱名之后。《钦定大清通礼》中载:“遂拆墨卷弥封,以墨卷授正考官书名次,以朱卷授副考官书姓名,别录一纸授吏依唱姓名,及某府、州、县,某生习某经,遍告在位者,书榜、书题名录,既毕,吏敛朱墨卷于箱,奉印铃榜封题名录于函,置中案上。”<sup>[4](P374)</sup>可见题名录是在拆卷、唱名、填榜时一体完成的,完全是科举中的官方行为。小说《西湖二集》中也曾写道:“(永乐爷)因此把登科录上削去了名姓,反刊第一甲一名韩克忠、第二名王恕、第三名焦胜。”题名录可以改动,但进行改动的是“永乐爷”,这正符合题名录刊刻的官方行为。

官方刊刻题名录并不表示民间所有的题名录均由官府提供。小说《十二楼》中曾说:“(詹公)及至秋闱放榜,买张小录一看,果然中了经魁。”《快心编》中也说:“玉飞在门首,买得北直乡试全录,晓得科场为失火改期。”此处又提到科举科录中的“小录”和“乡试全录”,其实就是题名录,但是小说中所指的乃是坊间翻刻的官刻题名录,是科考放榜之后随处可以买到的,这表明官刻题名录于当时坊肆中翻刻的现象十分普遍。《两般秋雨盒随笔》中记,曾见士人方姓装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题名录,因与之“乡举之岁,恰当花甲一周”,故题诗一首,云:“字迹颇工整,首尾无漫涣,想见吟卖时,狼籍坊市遍。”<sup>[5](P208-209)</sup>可见,题名录虽为官方刻,但于坊间十分盛行。



小说中提到题名录,多是讲其中人物在参加科举之后,亲朋好友由题名录中见及此人,以示科举中式的荣耀。《快心编》中写道:“见北直登科录上有‘凌六鳌’名字,系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由监生出身,中北直乡试第二名经魁。”《巧联珠》中有:“早是重阳时候,外面传进各省《题名录》来。方公展开一看,只见‘应天第十三名富毅,苏州府吴县人’。”一般从小说中来看,题名录所列的信息多是中式者的姓名、籍贯、出身、名次等项。其实,在各种科录之中,题名录所刻内容是比较全面的一类。清人震钧曾买得康熙十一年《江西题名录》,其中记有:监临,提调、监试、主考、同考以及他们的官职、品级、字号、科第、籍贯,并详载每职有几人;继而为是科考试题目,头场四书义三篇、经义每经四篇,二场论、诏、诰、表、判,三场策五道;之后为同考在五经的分房,其中“《易》三房,《书》二房,《诗》二房,《春秋》二房,《礼》二房。”<sup>[6](P50)</sup>其后录中式者,是科共五十七人,分别按名次载入他们的姓名、籍贯、所选的经义,“最后附刻诸文”,并有主考所作之序文,文辞典重、骈俪雅正,震钧说:“此录可考国初掌故,此表又可见文风之盛。”<sup>[6](P51)</sup>作为记载科举之盛、中式举子之荣耀的题名录,内容甚详,形式也极为正式,完全可以作为考查当时科举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中记录的举子的籍贯更成为研究古代科举和地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乡、会试另有官刻试录,分别为乡试录和会试录。乡、会试录刻印中式者的相关信息和文章,与题名录相似。

同年录也是科录中之一种,乡、会试均有。《快心编》中写:“李绩道:‘《同年录》上有是有一个姓山的,老夫却忘了他籍贯。’”同年录与题名录有相同之处,其中记录了中式者的相关信息。但同年录的刻印有特殊目的,明代崔铎讲:“黄御史希武编次《乙丑同年录》,属冯无锡景祥刻之,而以序属铎。吾三人者,皆见于录中故也。凡举进士必有登科录,姓名、郡邑之类皆在焉,复编此者以省叙也,以省叙者便览也,其便览者为有事于四方者也,同年有世讲之义,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sup>[7](P370)</sup>他指出同年录的刻印之意,倾向于叙同年之谊,刻印的初衷与题名录不同。

此外,同年录更类似于一种姓名录,它另有查考中式者名号之用。《说郛》中《人之小名》一条记云:“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礼任真,故其小

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sup>[8](P715)</sup>从中可见,同年录中除记中式者姓名之外,还录有字、号一类,盖《说郛》中所讲之“小名”。因此,在题名录、乡试录等各种科录并行的情况下,同年录更偏重于它所记录的同科考中者本身的相关信息。

与同年录相似的还有一种科录,即序齿录。商衍鏊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将序齿录归为同年录中之一种,<sup>[3](P87-88)</sup>但依笔者拙见,将二者分别列为科录似乎更为合适。所谓序齿录,即乡试或会试的同科中式者不按名次而按年龄的大小排名,由长至少依次排列。

序齿录与同年录的不同之处,还不仅仅在于排列次序的不同,序齿录中注明中式者的个人信息甚详,这是题名录等各种科录无法相比的,其中除中式者的姓名、籍贯等项之外,还有三代、兄弟、配偶的相关信息。小说《五色石》中写:“小姐道:‘今不须疑猜,只把他的序齿录来查看便了。’……只见解元黄琮名下注道:‘原聘陶氏,系前任福建臬宪、现任赣州二府陶公隐斋女,未娶而卒。’”有关序齿录的内容在小说中出现得不多,这是比较详细的一条,其中在解元名下还有小注,对于婚配情况记录颇详,故而小姐所说的“只把他的序齿录来查看便了”,此例在其他科录中不曾有过。明人孙承恩在《方齿录序》中,对其中的各项内容有所介绍,中云:

两京洎诸藩士之登名贤书者,复有私录制,往往殊焉。方齿录者,辛卯应天同榜诸君子所刻也,分方以列名,随方以序齿,有字焉,有号焉,及其父母焉,及其配焉,及其昆弟焉,及其子焉,及其里居焉,何详且备也,详且备者厚之也。<sup>[9](P397)</sup>

序齿录中的姓名、字号、父母、配偶、兄弟、子嗣、里居情况详备如许,这正是此录与其他科录大不相同之处,即使同年录也不能与之相比。

序齿录的刻印是中式举子的自发行为。明清小说在提到中式后的各项事宜时,常常将刻序齿录与会同年、刻朱卷等事放置一处,说明序齿录的刊刻是由举子们自己主持。李梦阳在《代同榜序齿录序》中说道:“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乡试,成业以其名并文录之献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龄等,乃相谋为私录,而齿序焉,注其字、年、籍、经,并榜之名第,题曰:‘同榜序齿录’,乃于是请之监察陈公观焉,陈公曰:‘嗟,诸生公录之矣,汝复私录之乎?’宇龄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不能无者也,以其类私而实公也。’”<sup>[10](P488)</sup>明人宗臣在《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中也说:“嘉靖戊午十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

樊公,既已登武之雋五十人录之矣,先是文而录者,辄又私序其齿勒之书。”<sup>[11](P134)</sup>此二序都说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即序齿录之“私录”性质。从《代同榜序齿录序》中的陈公之言,不难看出,嘉靖之前尚无序齿录之说,《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中所叙之意与陈公相同。序齿录之前已有公录,此录实是诸生自发之举,是“惟齿之叙,则长长而少少,真弟兄”之意也,谷宇龄等人刻印序齿录均为此意,可以说序齿录是自此之后才开始刻印,并继而盛行于中式士人之间的。

#### 参考文献:

- [1]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科试考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叶梦珠. 阅世编:科举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 商衍鏊.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 北京:三联书店,1983.

- [4] 钦定大清通礼[M]//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 [5] 梁绍壬. 两般秋雨盒随笔:重宴鹿鸣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6] 震钧. 天咫偶闻[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 [7] 崔铎. 洵词:乙丑同年便览录序[M]//四库全书:第126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 陶宗仪. 说郛:人之小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 孙承恩. 文简集:方齿录序[M]//四库全书:第127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李梦阳. 空同集:代同榜序齿录序[M]//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 [11] 宗臣. 宗子相集: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M]//四库全书:第128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陈伟)

## On Irregularity, Publication, and Enrollment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Described i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Yu-chao, LIU Ming-kun

(Chinese Depart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Many writers of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the examinees, they vividly described the irregularity, publication, and enrollment of the examin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ir novels, which makes up the lack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Key words:**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mperial examin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enrollment

(上接第16页)

## The Principle of Context in Donnellan's Theory of Description

ZHU Yao-ping

(College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For Russell, description is different from proper name in that it does not refer directly to an object. Strawson does not think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scriptions and proper names is as bigger as Russell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Strawson has overlooked the attributive use of descrip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centrating his attention to the referential use of description.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Donnellan and Russell or Strawson is that the former maintains to judge the functions of d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put in use. Furthermore, both Russell and Strawson hold that if the object denoted by a description does not exist, the sentence including the description would be meaningless. For Donnellan, such a kind of view may be appropriate to the attributive use of description, but as far as the referential use of description is concerned, it is completely wrong. When a speaker regards a description as the means to refer the given object, he can make his listener to understand what object he is referring, even when the description does not describe the object rightly. In one word, Donnellan has carried out the principle of context more consistently than Strawson.

**Key words:** Russell; Strawson; Donnellan; descriptions; reference; context